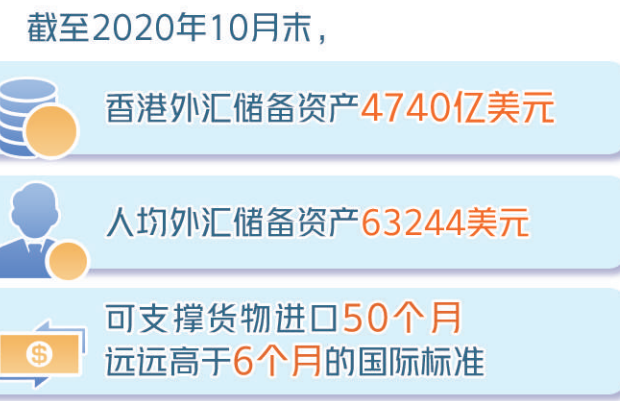




扎根上海打造健康品牌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乔山健康科技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台湾、产品覆盖90多个国家的全球健身器材领先企业。落户上海20年来，其产能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

乔山是海内外众多知名健身俱乐部的指定供应商，我国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上也有乔山的产品。深耕大陆20余年，乔山始终把高效的管理水平和先进的设备工艺融入产品生产中，秉承“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企业精神，在研发、制造、质量控制等环节严格把控，建立自有品牌、自有销售渠道的发展模式，使上海生产基地的产能每年呈大幅增长，效率较最初水平大幅提升，产品90%销往海外市场。

乔山上海公司总经理李永楷对大陆市场非常有信心。他说，国家大力倡导“健康中国”，大型国际赛事接在中国举办，影响和带动着大众运动健身习惯的养成，这些令中国的运动健身行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2年至2019年中国该行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超6%，预计2022年规模将进一步超过2000亿元。

在这样的市场趋势下，乔山在3年前就将发展焦点放在中国市场，希望大众能够使用专业健身器材进行科学有效的健身。目前，乔山在上海拥有超过15万平方米的专业产线，通过了ISO认证及世界各国产品认证，产品拥有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生产资质，仅健身器材生产制造员工就超过2400名，年产超过30万台健身器材，2020年生产与销售整体营收超过17亿元人民币。

2017年，乔山将体育用品制造与旅游、文化与创意、健身与乐活相结合，以“健康”为核心，围绕企业文化与产品特色，打造主题为“乐活之旅”的工业旅游项目，让公众更了解品牌价值的同时，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上海体育示范基地之一。

自2020年起，在相关部门支持下，乔山以“海峡两岸交流”为主题，协助台协体育休闲工委、整合台协会员及企业资源，在上海嘉定、普陀、长宁等区陆续举办系列市民城市定向赛。此举不仅让参赛者融入城市“探索之旅”，还让台湾民众通过赛事了解到上海城市文化景观和市民生活状况。

“未来，企业将筹划在大陆设立新的生产制造基地，同时规划在上海成立制造总部，将上海工厂成功的经验复制到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中。”李永楷表示，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智能化、场景化的健身服务，企业还将结合上海的“十四五”规划，重点在“互联网+”、健康医疗、在线新经济等几个千亿元级领域着力发展，推动全民体育，全力支持国家政策发展。

香港金融市场弹性强韧性足

郑联盛

过去一段时间，香港面临复杂且多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对香港经济金融体系造成新的冲击。一年过去了，香港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不利因素，呈现出较强的弹性与韧性，不仅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且继续发挥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融通功能。

香港金融市场整体稳定有序，各子市场稳健运行，市场弹性和韧性较为凸显。在货币市场上，2020年香港整体维持低息环境，港元短期利率低位运行，流动性较为充足，港元隔夜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年末进一步跌至0.04%。在汇率市场上，香港联系汇率机制运行有序，港元整体保持稳定。2020年港元兑美元汇率一直维持在贴近7.75港元/美元水平，多次触发强方兑换保证，港元不仅保持稳定且兑美元较为强势。2020年4月至年底，超过500亿美元资金净流入港元体系。在资本市场方面，2020年恒生指数小幅下跌3.4%，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冲击和西方势力干扰中，香港资本市场整体保持稳定并彰显较强韧性。2020年香港交易所IPO市场全年募资额达3942.46亿港元，较2019年继续上涨26%，募资额略逊于纳斯达克屈居全球第二位。

香港金融稳健发展，金融市场韧性凸显，具有多方面的支撑。一是香港经济社会秩序有所恢复，而内地疫情控制果断有力、经济复苏

较为扎实、对外贸易出乎预期，为香港的贸易金融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例如，港交所七成左右的交易量和募资量来自内地机构。二是全球疫情蔓延仍在深化，主要经济体将持续实施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尤其是资产购买计划，这使得全球利率水平极低，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货币及政策基础。三是香港外汇市场仍是连接东西方金融市场的重要枢纽市场，香港与伦敦、纽约并称为全球三大外汇市场，国际资金融通功能十分显著。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数据，香港是亚洲主要的离岸美元融资中心，97%的外汇交易、58%的跨境贷款和其他银行工具、43%的跨境衍生工具以及37%的存款均以美元计价。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吸引力提高了，而香港是投资内地的中转站，国际资本集聚香港再转投内地。2020年北上资金净流入高达2089.32亿元，其中，沪股通和深股通分别净流入855.13亿元和1234.1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具有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政策经验和物质保障，这也是香港金融市场体系韧性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香港金融管理部门汲取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以开放的发展理念、规范的市场法治、专业的风控能力为香港金融风险处置和金融稳定维持提供坚实的政策保

障。另一方面，香港具有扎实的财政和储备基础来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末，香港外汇储备资产4740亿美元，人均外汇储备资产63244美元，可支撑货物进口50个月，远远高于6个月的国际标准。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香港特区政府2020年出台历史性的公共危机纾困政策，涉及金额3000亿港元。截至2020年11月末，香港财政盈余储备仍高达8419亿港元，可维持约14个月的支出。

在跨国金融机构心目中，香港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香港是亚太地区美元交易支付中心，此前有市场人士担忧亚太地区美元交易支付中心会从香港转移至新加坡等地。但是，2020年较多受访机构认为美元交易支付中心转移至其他城市需要时间，更需要众多外部条件，市场体系“惯性”力量不容忽视。以纽约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伦敦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市场参与者仍将纽约视为全球首要金融中心。再以伦敦为例，英国脱欧前，外界担心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下降、欧洲金融中心将转移至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但实际上这一转移并没有发生。部分受访机构强调，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应只看市场体量大小、榜单排名高低，更要考量其国际化程度与全球链接力，这是市场韧性之所在。

最重要的是，香港金融市场弹性与韧性的发挥及保持依托于香港独特的双重定位。一方面，对于内地，香港是全球金融资源及其他要素集聚并进入内地的中转站。另一方面，对于国际，香港是中国参与区域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桥头堡。这种特有的双重定位使得香港成为内地与外部经济互动的枢纽，这既是香港金融市场韧性的基础，又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价值的依托，也是香港未来持续繁荣发展的保障。

展望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大有作为。一方面，香港要注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夯实金融稳定的经济基本面。作为全球性人员及资源中转枢纽，香港应把控制疫情放在首位，注重对输入型疫情的有效防控，防止疫情在港传播。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重点支持医疗、失业、社会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等财政支出，重点关注国际收支、房地产市场、银行、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风险及应对，确保经济金融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香港应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弹性与韧性，优化金融中心功能，强化多个金融市场统筹，带动内地更高层次金融开放，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香港全球产业链连接功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促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主任）

香港将军澳大桥主桥安装成功

日前，由内地企业独家承建的香港将军澳大桥主桥成功安装，这一外飘式双拱钢桥重约10000吨，以高强度钢材建造，跨度200米，建成后将是全港跨度最大和单体最重的钢拱桥，将成为香港又一地标性跨海建筑。将军澳大桥预期于2022年竣工。

将军澳大桥位于香港新界东南侧的将军澳海湾，是连接将军澳和蓝田隧道的重要跨海通道。据介绍，将军澳大桥实现了多个“首次”。钢桥的双拱使用了S690钢材建造，这是超高强度的钢材在世界上首次大规模应用于桥梁建造；万吨钢桥整体加工、整体运输、整体安装，这在中国是首次；采用利用海潮涨落的“浮托法”安装大型钢桥也是中国的首次。

新华社记者 陆敏 吴俊怡 李钢 摄影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系列访谈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有力举措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有力举措，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丰富发展的重要篇章。

符合宪法和基本法

香港特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香港市民参与政治的基本形态。

香港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分别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具体的产生办法和制度程序则规定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之中。本次完善香港特区有关选举制度，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不涉及香港基本法正文。

此次完善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首先，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再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在国家层面完成对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后，香港特区再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田飞龙表示：“本次修法路径的选择是合宪合法的，是有充分理据的。”

他介绍，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其中，宪法是基本法的来源和基础，也是香港选举制度的最终宪法依据。

此次完善选举制度，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有关的制度创制权，其宪法上的主要依据是第31条、第62条，相关条款赋予了全国人大对特区的创制权及规定有关制度的宪制性权力。按照我国宪法惯例，全国人大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相同议题制定更为具体的制度架构。

从香港基本法角度看，田飞龙认为，中央在基本法上享有全面管治权，对基本法的重要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的发展享有主导权和决定权。此次修法是中央依据宪法对基本法附件的修改和调整，符合基本法正文有关香港选举制度原则的规定，也符合“一国两制”方针，是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丰富发展。

他同时提到，香港基本法第1条和第12条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规定了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及与中央的权力关系，香港国安法第2条对此予以了确认。从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基本法条款中，也表明中央对香港政治制度的主导权和决定权。

总而言之，此次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进行完善，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也符合香港基本法，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

“中央依照惯例明确选举制度的框架和核心，具体制度细节仍有待香港修改本地相关法律加以落实，本地仍有法律空间按照‘爱国者治港’原则和中央有关决定要求进行配套修法及查漏补缺。”田飞龙说。

是权力也是责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

田飞龙说，全国人大享有国家最高立法权，并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享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此次决定的法律基础，在于宪法的特区制度创制权和基本法有关选举制度的原则规定。“全国人大行使的，是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中的合宪性权力，其权威性和法律效力不容挑战。”

基于上述宪制地位和权威性，全国人大的此次决定可约束国家各级法定机关和特别行政区所有公权力机关，并对相关的下位法律法规之配套修改和完善产生制度支配力。基于全国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针对性具体修改，并在此基础上，为香港特区修改本地有关法律提供宪制性依据和指南。

田飞龙认为，选举制度的完善，不仅有助于挤压和排除中乱港势力、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及外部干预势力操纵选举、渗透权力架构及从事危害宪制秩序与国家安全的空间，而且将促进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清理和重塑香港政治风气与政治秩序，催生爱香港与爱国家相统一的新型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规范。

“完善选举制度以中央主导和理性的制度建设方式，帮助香港走出‘过度政治化’陷

阱，恢复社会互信团结，并产生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新认识和新认同。”田飞龙认为，此举将推动解决香港“人心回归”与爱国主义精神落地扎根的治理问题，重塑“一国两制”优良健康的精神秩序与制度风貌。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是特区及其制度的唯一创建者。”田飞龙强调。

他进一步强调，此次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完善，让我们进一步清晰理解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享有制度创制上的主导权和决定权。这一权力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可以根据香港管治实际与社会发展需求对有关制度进行完善，确保香港制度变迁的顶层权威性和活力来源。

同时，在确认中央主导的前提下，我们也需要坚持在重要的制度建设议题上激发和推动香港特区政府主动承担法治责任，做到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无论是国安立法还是选举修法，其实都是中央主导与香港协同的制度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一国两制’良性互动关系加以确认。”田飞龙说。

谈及香港未来民主政制发展，田飞龙强调，要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方针，要坚持中央的主导权和决定权，也要尊重和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在高度自治范围内服务于香港全体居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诉求和制度进步期待。